聚焦文学新力量

余一鸣,生于1963年,江苏人。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江入大荒流》、中篇小说《不二》《入流》《愤怒的小鸟》《种桃种李种春风》等,曾获2012年人民文学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2011《小说选刊》年度奖、《人民文学》2011年度小说奖、金陵文学奖等。

“潜规则”与新江湖

□汪雨萌

该如何形容余一鸣小说里的那个世界呢?我觉得有一个最恰当的词语,就是“潜规则”。如今,对“潜规则”一词被单向度地过分演绎,使其失去了原有的丰富语义。余一鸣笔下的“潜规则”却是一种还原的、广义的,甚至完全成为体系的一套亚制度。过去我们常常用另一个词语来概括这样的体系,那就是“江湖”,然而我们却不能用“江湖”来统领余一鸣的作品,因为在他所描绘的世界里,“江湖”原有的热血义气都不复存在,如今的“江湖”已经成了“潜规则”,只剩下冷漠、严苛、虚伪和毫无原则的利益纠葛。

这套“潜规则”在余一鸣作品中的合理性,源于他笔下的那些人物。这些人物出身乡村或是城市贫民家庭,为了自己和子女的未来隐忍蛰伏却又不顾一切。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中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分化进行了十分透彻的分析,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子弟之所以在成人之后在阶级上形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小部分人出人头地,成为有出息的上流人士,大部分维持原状,无法逃离底层工人阶级,原因正是“潜规则”与社会正式规则之间的分离与冲突。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威利斯的这套理论虽说不能完全适用,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受到启发。在我看来,余一鸣笔下漂泊在“高大上”的城市生活中的贫民子弟以及他们和都市“潜规则”之间从屈服到适应的关系,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阶层构成法,而余一鸣平淡、娓娓道来的写法,却将这一构成过程的残酷与挣扎反映得更加深入和直接。

《种桃种李种春风》可以说是余一鸣在农村子弟塑造上最为全面和完整的一部作品。大凤和她的丈夫家宝从村里来到城市打工,就是为了让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享受同样的教育资源,最终考上好大学,过上好日子。谁知,在停车场工作的家宝却因车祸身亡,大凤和儿子清华的生活变得更加举步维艰。为了得到一个进到市重点就学的“指标”,大凤四处“找关系”,贱卖了家中的房子,向原先势同水火的邻居低头,去教育局退休的老局长家做保姆,忍受老人时不时的暧昧举止,甚至不惜与重点学校的特级教师乃至厨师进行性交易。但最终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大凤还在为儿子的升学问题四处求告无门时,老局长家的孙子却已经计划着出国留学,强烈的对比使大凤的内心最终走向了崩溃。

这是农家子弟与城市规则的第一次交锋,他们在正常的城市规则与社会秩序中无法获得公平的对待,清华再怎么努力也无法与老局长的孙子陆海波公平竞争。因此,大凤除了向“潜规则”寻求帮助之外毫无办法,即使她感到屈辱、厌恶,也不得不向潜规则低头。不仅是大凤,看似已经在城市立住脚跟的小梁老师和吕特也同样遭受着城市逻辑的歧视与践踏。小梁老师聪明清高,为人规矩,在奥数教学上很有一套,但却敌不过教育局的一纸文件,奥数班叫停,小梁老师失去了工作,跳楼身亡。而吕特虽然身为特级教师,却因为出身贫寒,一直不被重视,只有在大凤面前才能耀武扬威。对潜规则的屈服源自于对规则的不信任感和恐惧,也同样来自城乡之间决然的断裂。来到城市之后,再深厚的乡土也无法成为这些漂泊一族的后盾,他们被城市生活的脚步裹挟而去,失去了所有的保障和依靠。而潜规则却在某种程度上披着“故乡”和“人情”的外衣,让初次征战就铩羽而归的农家子弟感受到一种虚幻的温柔。大凤与吕特、与罗大厨的性交易,虽然目的明确,却又试图营造出一份义气与温暖,而小梁老师的奥数班之所以接收清华入学,虽然直接的原因是梁老五得到了大凤家的房子,但小梁老师的负责也同样让大凤感激。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潜规则逐渐成为这些贫民子弟心甘情愿的行为守则。

对于逐渐成熟的潜规则体系,余一鸣显然用了更多的笔墨。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便是中篇小说《不二》与《潮起潮落》。《不二》讲述的是几个建筑承包商与“二奶”之间的故事,这些已经相当体面的成功人士,不论他们过去是砖瓦匠还是木工师傅,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交往圈和人际规则,而《不二》所侧重的,便是对待女人的规则。在这样的交际圈中,女性很难获得应有的地位,包工头包养的所谓“女研究生”,不过是充当门面的花瓶和满足男性需求的玩具。其他身份的女性在这片江湖中的遭遇也同样不容乐观,“大奶”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自己丈夫的控制权,包工头们对待结发妻子的方式与对待“二奶”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有人将之谓为“包大奶”,她们困守的围城,早就是一座空城而已。而企图在这男权当道的江湖中分一杯羹的事业女性则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她们的聪明才智永远在遭受忽略,她们交易的等价物似乎仅仅是她们的身体,也正因为如此,她们还要面对丈夫的猜忌、暴力和家庭生活的不和谐。

《潮起潮落》更加能够说明“大奶”和事业女性的双重危机,民间融资者范青梅看上去是成功的女商人,但面对丈夫的背叛仍然无计可施,只能向“小三”范佳惠发泄怒火。银行精英丰玉洁甚至要亲自开车送丈夫去会所。再强势的女人都无法掌控自己的丈夫与家庭,而她们的生意也举步维艰,时刻需要背离她们的本性,去曲意逢迎,去相互算计。在错综复杂的男权社会里,她们孤立无援,只剩下一纸支票,支撑着她们生活的勇气。年轻女性的状态也不容乐观,她们固然比中年女性有更多的选择、更广阔的眼界,但她们要面对的诱惑与逼迫也比范青梅们更多。《放下》中的刘清水、《不二》中的孙霞、《潮起潮落》中的范佳惠、《淹没》中的陈洁,都是年轻聪颖、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余一鸣在描写这些人物时所使用的充满温情、希望与宽容的笔触,但我们也同样能看到这些女性向新江湖、“潜规则”所做出的牺牲与妥协,甚至被它的粉饰所迷惑,心甘情愿地掉进陷阱。

男女关系是永不过时的话题,余一鸣在《不二》等篇目中以男女关系为切入点,实际上可以延伸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民间传统甚至江湖作风与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女性主义、拜金主义在经历了碰撞之后,并没有相互削弱,反而不断交织、扭结在一起,组成了更加令人无法挣脱的江湖规矩,令弱势者不断屈服,强势者也更加难以自拔。

《入流》可说是余一鸣“潜规则”体系的一次全面展示,那群在长江上讨生活的船老大们,虽然看似处于城市与乡村之外的第三地,但是我们却可以从这部小说中清晰地看到这种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交织起来的新江湖的全貌。如果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入流》简直就是一部武侠小说,有武林盟主白脸,有帮派掌门陈栓钱,有落魄老前辈罗金宝,有劫富济贫的世外高人,有贪财贪利的势利小人,甚至有落草为寇的官员,有背靠大树的“孙二娘”……人物来往、交锋无不充满神秘的江湖气息,有暗号,有规矩,有称兄道弟,也有背后捅刀,时间仿佛已经在这条江上凝固,将读者传送进了某个遥远的,远离现代文明的江湖现场。然而,这套江湖的外衣,这一系列似乎与现代文明无关的“潜规则”却仍然无法看作是在真空的“世外桃源”中凭空构架,也并不完全来源于传统和属于传统的江湖,且不说那些在船舶方面技术性的表述,船老大们和船帮头目的心态早已不属于那个遥远而淳朴的江湖,甚至已经不再属于养育他们的固城乡村。罗金宝、陈老三对金钱的渴望,陈老三在船舶索赔上展现出的冷静,白脸对船帮政治化与企业化的管理和对服务业的借鉴和利用,无一不带着现代文明的烙印,江湖最重要的价值“义”早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不断膨胀的利益、欲望和其带来的冷漠、残酷、不择手段。陈栓钱从一个古道热肠的船工,到后来成为冷酷无情的船老大,他的改变和生活在城市中的东牛们、张大东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不仅仅是城市,乡村也难逃“潜规则”的渗透。《放下》是余一鸣作品中为数不多的描写乡村巨变的一部,乡村为了招商引资牺牲环境,牺牲世代农民和渔民赖以生存的水体,疯狂养殖蜊蛄与蟹,与当年水清山明、怡然自得的农村早已是天壤之别,商业化、政治化正一步步成为乡村生活的重要主题。在描写城市的作品中,余一鸣也没有像其他作者那样将乡村作为对比性的存在,他笔下的乡村同样人心不古,《种桃种李种春风》中锱铢必较的邻里关系,《放下》中疯狂追求经济效益的农民,《淹没》中为了利益才重聚的虚伪宗族……一种传统的“乡愿”与现代价值观相结合的新的乡村法则,也正是余一鸣所展现的“潜规则”与新江湖。

将这种“江湖”推向极致甚至荒诞化的作品是《愤怒的小鸟》,一个中学生竟然依靠着游戏中的“帮主地位”,让现实生活中的局长对他俯首听命,任他呼来喝去,这难道不是传统江湖的复兴吗?英雄不论出身,不论年纪大小,拼的都是实力。然而游戏中的“帮主”金圣木还是要为现实的处境头疼,他的父亲给妹夫做司机,母亲是民办教师,每日琢磨着他的奥数题,不管金圣木在帮里如何杀人如麻地位崇高,局长在请他吃了一顿饭之后也再无音讯,他自己的日子照样过得比表妹寒酸,连iPad都买不起。游戏中团结一心的帮派并不能给他实际的帮助,反而让他在真实与虚幻的交错中更加混乱。最终,金圣木为了能够玩愤怒的小鸟而杀了表妹,但他杀人之后无所谓的表现,证明了他对真实与虚幻的混淆。当下的网络游戏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平台,这种以虚拟的人际交往为支撑的游戏方式,是否相对单纯公平,是否真的是传统与江湖的复兴?余一鸣给出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论人物设定多么复古,帮派多么繁杂,战斗多么如火如荼,但仍然是现代科技与现代文化的产物,玩家真实的经济地位往往决定着他们在游戏中虚拟的地位,像金圣木这样的“帮主”,简直就是奇迹一般的存在,而更多的情况下,没有经济支撑的玩家,即使再怎样技术流,即使是在这片“江湖”中,也一样无法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尊严与位置。以金钱为主宰的新江湖,正在一步步侵蚀着每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大、城镇化的深入、进城务工人员的不断增加,描写平民少年成功记的作者不在少数,描写在城乡价值观中徘徊不定、无所依靠人群的也很多,但余一鸣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角度,一个新的人群。这些业已成功的人们,他们如何看待他们从小生长的传统,如何看待逐渐变化的乡村,又如何理解城市,理解他们感到新鲜胆怯的现代文明?余一鸣用他细腻的描写,感同身受的深入,描绘着、展示着他们的扭曲、异变和内心的痛苦与挣扎,以一个个微小的人生,言说着一种普遍而宏大的东西、展示着这个国度的大多数所经历着、构建着的,深受其苦却又无法摆脱的“潜规则”。

■创作谈

从高考《考试说明》说起

□余一鸣

我的主业是高中语文教师,三年带一届学生冲高考,今年又是。我案头翻得最多的是高考《考试说明》,我所在的中学是名校,学生作文目标是达到“发展等级”。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标准,我和我的同事可以用它评判古今中外经典名著,让活着和死了的大师们羞愧不已。且摘录几条如下:

1.深刻:要求提出自己领悟的正确观点,能发人深省,给人启迪。2.丰富:要求记叙性文章形象丰满生动,叙事具体完整;意境深远,要求文学体裁的作品情景交融,含意深远。3.有文采:要求在通顺的基础上充分展示语言风采,提高语言表现力。4.有创新:见解新颖,材料新鲜,构思新巧,推理想象有独到之处,有个性色彩。

如果用这几条标准对照我自己的小说创作,是一件既有趣味也有意义的事。

“深刻”是挺大的一顶帽子,它戴在中学生头上,等于是直接扭断孩子们的脖子,戴在小说家头上也过于严重。但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必须有自己独到的视角、个性的思考和正确的价值观,我的理解就是写别人尚没写的,想别人尚没想到的。四五年前盛行“打工文学”,或称“底层文学”,小说主人公多是农民工。我也想写,但写不过人家。怎么办?我就写工头们。民工们的苦首先是物质层面,工头们开始要体面和尊严,精神层面的思考要多一些,于是就有了中篇系列《不二》《入流》《放下》《潮起潮落》等小说。社会转型期的精神特征在先富起来的人群身上更敏感和集中。这样的小说中不乏暴富者堕落的生活,但作为小说作者,我始终坚持扬善惩恶的道德立场,如果我达不到深刻,我至少崇尚灵魂高贵人性美好。写《种桃种李种春风》时,我一方面要将生活本色的一面呈现出来,又要经营人物复杂情感,从深处挖掘丑恶。我在修改时要求小说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写现实的丑恶不是引发泪水,而是激发思考和革新。人性沦丧的荒原上依然有人性美的芽尖。艺术说到底,就是把生活中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变低下为高尚,变痛苦为愉悦。

“丰富”这个词我的理解是繁而不杂,千山成就万水,万水凸现千山。有一种小说趣味讲究精雕细琢,讲究心钩角对,我的小说做不到,我觉得小说与这世界一样,天与人,人与人,都对应都互动,不得割舍。写教育题材的中篇小说《愤怒的小鸟》和《种桃种李种春风》,我一再告诫自己,我是业内人,千万不能囿于校园,要写完整的教育背景,要放在社会众生的大格局中反思。

至于“有文采”,我要求学生多用修辞手法,讲究词藻华丽,但对我自己的小说用的却是另一副嘴脸。小说完稿,我首先要做的是剔除其中的成语和其他书面语,除非这个小说人物是我的同行,是靠嘴皮子卖弄词汇混饭吃的人。“语言风采”首先是与时代同步,与口语密切联系才是有表现力的语言。应该说,当前社会中人物语言的诡秘和生机,堪称是小说家的丰盛大餐。尽管我是一个南方作家,我还是坚持认为,不能耽于小桥流水、清水芙蓉,而要捕捉天地众生间的约定密码,插白于明与暗规则,开颜可以笑不露齿,笑不捂肚,拍案则惊天地泣鬼神。这是我向往的小说语言效果。它追求的不是唯美,而是与读者的契合和响应。

最后一个要求是“创新”,这一条太难了,于学生难,于小说家也难。如果说形式的创新,当年我也曾追风,回头看,即使当年潮头作家的作品至多也只是拾了个招牌,而骨子里的创新,当是对生活的不断发现,如雷蒙德·卡佛所言:不要耍花招,你不必聪明绝顶,要有在简单事前目瞪口呆的资质。近几年的创作中,我怀疑我具有这种资质的可能,但从《不二》到《种桃种李种春风》,我用小说证明我没泄气,我在拽着自己的头发向上努力。

每次动笔写小说,我都要求自己先屏蔽脑中的作文教条,我是写小说。其实,对照高考作文的《发展等级》,我的小说还远远达不到这“高大上”的标准,可见,我不易,我的学生更不易。

■新作快评 王祥夫中篇小说《翩翩再舞》《长城》2014年第2期

如何找回自我

□张艳梅

王祥夫的小说没有宏大叙事,在他笔下,那些生活的琐碎感触往往能够呈现出特别细腻的质地,意蕴凝练,富有灵性,耐人回味。他对生活的理解、对人世的爱意自然而又热诚,令人感动。《翩翩再舞》亦是如此,既有丰富的人性伦理、家庭伦理思考空间,与某种特殊的人生情态有关,又内含着对人生的探究。

小说《翩翩再舞》写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人生状态。乔小强既不能找回曾经的舞台,也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李妮同样失望于丈夫的不能自控,又对丈夫的困境无能为力。生活对这一对夫妇来说,犹如一首谱错了音调的乐曲。当年,乔小强为了舞蹈拼命节食,饥饿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现在不跳舞了,身材多么完美也没有任何意义。于是,他拼命吃肉,既是出于自我补偿心理,也是对生活压力的微弱对抗。对于乔小强来说,生活没有什么寄托和追求,食物成了逃脱生活压力的避难所,他以此逃避让自己感到丢脸和无奈的生活。暴食症作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疾病,在现实生活中很常见。王祥夫写得耐心温和,没有病理分析,只是平静地讲述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讲述这两个人面对的问题。

小说没有正面去写复杂的社会生活,手术室不过是个隐形的剪影,厨房才是欲望的放纵之地。从厨房到手术室,两个毫不相干的空间,手术和切火腿的细节如此相类,其实有着隐秘的关联。两个人的焦虑心态与现实生活有关,也反映了社会的整体氛围。不仅是乔小强夫妇,缺少艺术美感,不断被生活驱赶,被泛娱乐化时代裹挟的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小说通篇围绕着吃肉这条主线展开,对于乔小强来说,这就是他活着的全部。李妮从开始的批评教育,又掐又骂,威胁诅咒,到最后的性制裁,都不能改变乔小强。最终选择了极端的办法,彻底摧毁了乔小强的肉欲。想象的疾病与生活的病态,终于合伙谋杀了一个人的食欲。在不再需要舞蹈,不再需要美的时代,真正的艺术越来越缺少观众。作为医务工作者,在手术室里,李妮面对人体切割,回到家中,她面对彼此的精神折磨。生活需要我们以严肃态度面对,在喧嚣浮躁的时代,有多少人能心平气和地看待自我和他人?

气氛的渲染,细节的捕捉,仍旧是王祥夫之所长。在这篇小说中,乔小强对肉食的渴望,带有一种隐约的破坏欲和偏执的病态,弥漫在两个人重复的对话中。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对话里,隐匿着深深的痛苦。

■评 论

雪域昆仑的感人篇章

□张守仁

刘烈娃的新作《天兵台》让我感到惊喜,没有多年在西域边疆、风雪高原上刻骨铭心的记忆,绝写不出如此大气磅礴、悲壮瑰丽的边塞小说。

最让我感动的,首先是天兵台连长梁昊和三十里营房兵站护士长苗婕之间动人的恋情。两人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团员,参军之后,梁昊患了急性阑尾炎,巧由苗婕精心护理。两人在西域邂逅相遇,回忆童年合唱团的生活,产生了爱慕之情。由于当地自然环境极其严酷,风雪弥漫,茫茫荒漠,他们分多聚少,只能用电话互递问候。这种暌隔、等待的苦恋,是望穿秋水的渴盼,更是撕心裂肺的煎熬。风雪之夜,梁昊写信给苗婕:“婕:我从来不知道,牵挂一个人,是这样的揪心揪肺。过早的独立和长期的边疆军营生活,使我养就了自以为是的‘男子汉气魄’,现在我才明白‘无情未必真豪杰’,这话可一点也不假啊!”他叮嘱苗婕,冰天雪地里巡诊时要带上指南针和纸笔,以备不时之需;还要求她出诊时穿暖点、多备些吃的,关怀备至。当梁昊深入冰洞抢救战友而昏厥时,赶来的苗婕果断脱下衣服,用自己温暖的肉体焐热心上人冻僵的生命,使他慢慢苏醒过来。苗婕后来在一次巡诊回营途中不幸身陷雪坑殉职,梁昊悲痛万分,坚守在雪域高原多年,即使高海拔使他心脏变形,他仍不为所动。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下山回京,他说:“我的父亲、我的妻子,我妻子怀孕在身的孩子全都牺牲在这里,昆仑山就是我的家!”这真是坚贞不渝、千古不朽的爱情。

感动我的还有天兵台战士们坚守祖国的牺牲精神。天兵台地势险要,环境恶劣,一年四季除了大风就是冰雪。周围全是乱石,寸草不生。这里海拔高、缺氧,没有蔬菜,几乎和外界隔绝。诚如哨卡墙报所说:“天兵台,离天三尺三,风吹满山石头跑,撒尿溅到国防外。”守卫在这险峻哨所的官兵们,其生活之单调、寂寞、枯燥,可想而知。然而,哨卡里的人们尽管有苦恼,却仍能苦中作乐,在院子里用石头建起了天安门城楼,砌出了万里长城,并在城墙上用红漆写上了“我在祖国怀抱,祖国在我心中”的豪言。河南兵赵小康一有空就摸出口琴吹豫剧《朝阳沟》,以释对家乡的思念。这些战士如果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精忠报国的信念、舍己为公的精神,绝不可能长期坚守在这里。他们是铁血男儿,常和死亡擦肩而过,不少人已把生命交给了边陲高原。他们是滚滚浊世中的清泉,是我们共和国的栋梁。

此外,小说《天兵台》让我感动的,还有境外柯尔克孜族同胞矢志归国、回到故里的赤子情怀。自古以来,柯尔克孜族是我国西北边陲的游牧民族。他们对祖国山山水水充满深厚感情,常说“山是柯尔克孜人的父亲,水是柯尔克孜人的母亲”。但在六七十年前的一次隆重的婚礼上,正当阿訇把烧馕分成两半递给新郎、新娘时,突然闯来一帮匪徒,接着发生了恶斗,燃起了大火。火灾之后,部分柯尔克孜人被迫流亡到邻国,阴差阳错成为他国居民。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用滴血的心思念着祖国的山水,牵挂着故乡的亲人。1984年10月,柯尔克孜族部落长赛麦台依致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恳请“批准我们回到祖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遗憾的是,捎这封信给天兵台的柯尔克孜姑娘阿依莎里亨,在路上竟因邻国士兵的枪支走火而被打死。

刘烈娃是个多产作家。她的《渡江》也非常令我赞赏。小说以解放军1949年春天渡江南下为背景,描写了两对军人夫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恩怨纠葛。他们从邂逅、结合到随军南下,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痛苦思改的老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激荡风云。正如男主人公张子腾在晚年所说:“甭管多大的英雄,也不能对这个世界没有畏惧。”可以说,《渡江》在人物刻画上的精准、思想开掘上的深度,堪称近年中篇小说中的翘楚之作。

刘烈娃既写短篇、中篇,又写散文、报告文学,还写电影文学剧本。最近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脊梁——女儿眼中的罗阳》,更是以罗阳女儿、亲友同事的回忆,把一个身负重托、勇于创新、忘我献身的舰载飞机总指挥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真正用心、用情、用泪写出了航天领域英雄人物的生动面貌,读来感人至深。

精神高原的魅力

——读刘迪生长篇报告文学《南国高原》

□陈道阔

儿时学中国地理,知道中国有几大高原,如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然而,北回归线上的广东地台,在青年作家刘迪生看来,也是颇不寻常的一方“高原”。

仔细地读过《南国高原》,不得不佩服作者刘迪生的慧眼和诗情浩荡的童贞情怀。在《南国高原》里,刘迪生浓墨重彩地写到了袁庚,写到了这位“袁老爷子”的“蛇口青年风波”和本书主人公徐克成的不解之缘。

在刘迪生笔下,“南国高原”是徐克成和他的“复大医院”的高度,在我的眼里,却是港澳的高度、深圳特区的高度、客家文化的高度、袁庚和他们那一代猛士的高度。徐克成因为站在这个“奇点”之上,站在那一代巨人的肩上,才让我们有了一种仰视的感觉。

从书中看,徐克成已逾古稀之年,经历了新中国的全部历史。这一代人多被诟病,他也曾参与过对恩师的批判。因此,他总是在忏悔。就冲这点,他起码是一位良知未泯、胸怀磊落的老人。读罢全书,我和作者一样,对“徐老爷子”也有了“倾风良切”的感觉:“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在世风沉沦、谎言亢扬之际,补缀着洞穿的道德底线,呼唤着人的良知,传播着科学的理性箴言。”

其实,我并不在乎徐克成老先生“站在东、西方医学成果之峰巅”、“将西方当代最新医学成果,全部端上了东方的盛宴”,也不在乎他的N次挑战或N个奇迹:因为,每一个成功者都会有自己的经典案例。我最欣赏的是他作为“复大医院”总院长的“经营”模式——

蛇口风吹衣袖,袁庚耳提面命,卫生部老部长陈敏章的殷殷嘱托……背负历史的使命、宿命一般,让人震撼也不解的是,徐克成进军“民企”开办医院的初衷,不过是“消灭红包”而已:这个目标是何等的渺小而卑微,却是困扰这个国家、这个行业的顽症死结。

他居然做到了。这位求学东瀛、讲学欧美、游学港台的医人,创办“复大”之初,“顶层设计”就赋予了“无缝对接”、“比踵世界”的全新生命和“量身标高”:“在徐克成看来,日本人能做到的事,美国人能做到的事,台湾、香港人能做到的事,内地,中国人,也能够做到。我们的素质、环境、条件……什么都不比他们差。那些想着理由拒绝人家成功经验的人是很可笑的,只不过说明他们自己是一群没开心智的无能之辈罢了。”于是,我从这部节奏明快的纪实读物里看到了希望——不必悲观、不要气馁、总有人在抚膺内省、开发心智的希望。

徐克成当然是在挑战死神、拯救生命,但在我看来,他挑战的更是没有底线的堕落黑暗,拯救的是这个时代虚伪的灵魂——我以为,这才是徐克成最了不起的“挑战”与“拯救”,堪称对一种社会“绝症”的“妙手回春”。

诚如作者在“后记”中写到的,“在这里,这个王国,这里的人文环境,这里的诚信指标,这里的意识形态,我们看到了一块天外飞来般的——‘空中花园’”。每一个有幸像徐克成一样出洋考察过或准备跨出国门的“肉食者”,应该都会从这部著作里受益良多:他那海纳百川兼容放达之情怀,像一块海绵,点滴不漏地吸取当今世界东、西方的最新成就,在自己的“枕中王国”隆起放目天下的精神高原。

记得此前刘迪生还写过一部关于志愿者赵广军的长篇纪实文学《点亮生命》。其中,刘迪生奔洪裂岸般的铺排叙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多是他辛勤采访的苦役回报。然而,就像茨威格的人物传记与小说同样被世人称道一样,这类文学也有它自身的艺术规律,作家的审美趣旨和文学造诣决定了写作对象的文学价值。我在《南国高原》里看到的,是这个时代极为罕见的、南国地标性的人物。集患者、学者、开创事业的管理者于一身的徐克成将这时代家国与个人的苦难和荣耀推向了极致。他的文学亮点是人皆有之的人生追求,是真实淡定的理想,而他的典型意义也正在于他独特的人生:诚如作者的感言——“他,是可怜的小白鼠,是万能的耶和华,其实,他是这个时代的圣人。”

“桃花源非神仙地,好人多处即梵天。”我于是可以理解刘迪生的笔意了:徐克成不是菩萨不是神仙,仅仅是一位“好人多处”的“带头大哥”。

撇开作者的孤高旨趣,《南国高原》的谋篇布局相当精致慎密,让人有一种曲径通幽、阅读妙赏的快感。对主人公徐克成的描述、提炼、升华,很见刘迪生的刀笔功力:小故事大背景、非常事平常心,抽丝剥茧、娓娓道来;泼墨工笔,飞白繁简,酣畅淋漓。在平面读物日见萎顿、相当凋零的今天,这部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是不大多见的上乘力作。